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斯大林語言學著作中 所闡明的語言與方言學說

蘇聯 阿瓦涅梭夫 著
李 佩 娟 譯



民 族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Р. И. Аванесов

УЧЕНИЕ О ЯЗЫКЕ И ДИАЛЕКТЕ
В СВЕТЕ ТРУДОВ И. В. СТАЛИНА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譯自“斯大林著作中所闡明的語言學問題”(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СВЕТЕ ТРУДОВ И. В. СТА-
ЛИНА) 莫斯科大學出版社, 1952。

2611/25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天才著作，不僅是蘇聯語言學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並且在理論方面也是近代最重要的一件世界大事。斯大林的天才新著作是創造性地運用和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無與倫比的典範，具有一般理論上的巨大意義。

斯大林的這些著作包含有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語言學說的完整的體系。這些著作不但揭穿了馬爾的所謂『語言新學說』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同時也解決了語言學上一切基本的和最複雜的理論問題。斯大林的深刻而明白的，準確而精微的公式，肅清了至今還籠罩着語言學界的荒謬絕倫的混亂狀態，特別是在所謂語言『新學說』的代表人物——馬爾的『門徒們』及其追隨者們中間。

語言學問題，特別是關於民族語言的形成問題，早在過去幾十年裏，就是列寧和斯大林所共同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和民族問題學說的理論注意範圍，因為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斯大林在自己許多民族問題的著作中，特別是在這些經典著作中，如『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及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等，對民族語言的形成提供了天才的理論，可惜，語言學者還很少去運用。

因此，很自然的，在斯大林特別有關語言學問題的著作

中，以很大的地位討論民族語言形成的問題，並且廣泛地討論到方言和語言形成的問題。正如斯大林所指示的一樣，民族語言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通常是在這種或那種地方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

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對於各歷史時期方言和語言的形成，提供了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為蘇聯語言史家真正的語言的歷史研究開闢了寬闊前途。

二

斯大林所創立的天才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體系的各個方面，是彼此密切聯系着的，是互相貫通的。斯大林教導說，語言是社會現象，語言的發展密切聯系着社會的發展，密切聯系着使用和創造這種語言的人民的發展：『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①

但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語言，正如斯大林所教導的，同時並不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語言既不可以列入基礎一類，也不可以列入上層建築一類。』^② 斯大林關於語言和方言的學說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從這個基本的和最普遍的原理中推論出來的。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二〇頁。

② 同上，第三五頁。

語言和上層建築不同，上層建築是同一經濟基礎存在着和活動着的一個時代的產物，而語言則『……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這許多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所以語言的生命是比任何一個基礎、任何一個上層建築的生命都長久得無比。這就是爲什麼不僅一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而且好幾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也不會使得在歷史上消滅一種語言，消滅一種語言的結構和產生具有新的詞彙和新的文法構造的新的語言。』^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語言和它的結構不能看作某一個時代的產物。語言的結構，以及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許多時代的產物。

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下基礎了。』^②

關於語言不是上層建築這一原理是和另一個重要原理密切相連的，即按照後一原理，語言不是階級性的現象，而是全民性的現象。事實上，如果說語言是上層建築，那麼它就與一切的上層建築一樣，是階級性的現象。斯大林已經指出語言不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並且指出語言的『階級性』的公式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語言作爲交際的工具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的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③ 斯大林確鑿的證明：『……語言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同樣地替社會一切階級服務。在這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五——六頁。

② 同上，第二四頁。

③ 同上，第一九——二〇頁。

一方面語言表現出對於社會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①

斯大林不止一次強調指出，關於語言沒有階級性而是全民性的原理是從屬於語言不是上層建築這個原理的。斯大林教導說，每一個基礎有適應於它的上層建築。如果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那麼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變化和被消滅。如果新的基礎產生，那麼也就會隨着產生適應於新基礎的上層建築。

斯大林說：『在這一方面，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一個社會內部這一種或那一種舊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歷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社會所有各個階級、幾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爲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爲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對於社會是統一的，對於社會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因此，語言作爲人們交際工具的服務作用，不是替一個階級服務而損害另一些階級，而是一視同仁地替全社會服務、替社會所有各個階級服務。這也就是爲什麼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替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可以替舊基礎服務，也可以替新基礎服務；可以替剝削者服務，也可以替被剝削者服務。』^②

因此，正如斯大林所指示的，語言表現出對於社會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個別的社會集團、個別的階級對於語言遠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爲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〇頁。

② 同上，第三——四頁。

自己的利益服務，把自己的特別的詞彙、特別的術語、特別的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這方面，那些脫離人民並且仇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層份子表現得特別厲害。他們創造「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客廳「語言」。在有些著述中常常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錯誤地當作語言，如「貴族語言」、「資產階級語言」以及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語言」或「農民語言」、很可怪的，我們有些同志竟以此為根據，作出什麼民族語言是虛構，真實存在的只有階級語言的結論。』①

斯大林說：『……這樣的結論是極端錯誤的。』②

『階級的』習慣語或同行語都不能認作是語言，『……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③。而這些『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都沒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語言完全是為整個社會服務的，然而這些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只是在某一個階級內部，主要是在某一個階級上層分子的狹窄範圍內通用。因此它們沒有任何語言的獨立性，並註定不能有所發展；它們不能發展為獨立的語言，不能排擠民族語言，不能代替民族語言。如果不是這樣想法的話，斯大林說，『這就是喪失歷史前途和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④。

地方或地域的方言則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斯大林把它和『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截然地區別開來，並認為地方方言在民族語言形成的歷史中具有極重大的意義：『相反地，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〇——一頁。

② 同上，第一一頁。

③ 同上，第二四頁。

④ 同上，第一一頁。

地方（「地域」）方言，是替人民羣衆服務，並且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爲民族語言底基礎並發展爲獨立的民族語言。」^①

大家知道，地域方言正是方言學的科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斯大林關於它在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的指示，提高了作爲科學學科的方言學的意義，特別是歷史方言學在建立語言歷史中的意義，並同時要求我們在研究某些現代方言時，須有深刻的歷史主義觀點。

馬克思主義對各種方言及語言研究的態度，要求我們十分明確的回答語言在其發展過程中怎樣變化的這一問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馬爾及其『門徒們』和追隨者們製訂了所謂語言發展的階段論，斷言發展的進程是突變式的，從舊質過渡到新質是以爆發的方法，以破壞舊語言創造新語言的方法來實現的。斯大林指出這是荒謬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它是由語言似乎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這一荒謬前提產生出來的。

而實際上，語言不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它的變化也不同於上層建築的變化。

斯大林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爲語言從舊的質到新的質的轉變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而是經過新質的要素的逐漸積累，也就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②

『馬克思主義不承認在語言發展中有突然的爆發，有現存語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語言的突然創造。』^③ 因此，斯大林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四三——四四頁。

② 同上，第二六頁。

③ 同上，第二五頁。

說，在馬爾的語言發展的階段論中很難找到多少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融合論是與語言發展的階段論密切聯系的，它是馬爾及其『門徒們』所大事吹噓的好像是語言『新學說』的卓越成就，斷言各語言的融合彷彿就是新語言的質的發展的主要途徑。語言融合論是從不分皂白地否認語言系族出發，認為新語言的形成是以爆發的方法由於非親屬語言的融合，『匯合』的結果。斯大林證明：『兩種語言融合並不產生什麼新的第三種語言，而是其中的一種保存起來，保存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使它能按其內部發展規律繼續發展着。』^①斯大林所論述的天才原理和馬爾的融合論相反，認為語言是按其內部的發展規律，向前發展着和改善着的。

『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如果這一點是對的，那就應當承認，語言融合論不僅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甚至沒有提出這個任務，——它簡直是忽視這個任務，或是不懂這個任務。』^②

三

總之，語言不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語言不同於上層建築，它不是某一個時代的產物，而是許多時代的產物；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立基礎；語言在它的歷史一切階段上都不是階級性的現象，而是全民性的現象；語言的發展是經過新質要素逐漸的長期的發展，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語言是按其內部的發展規律，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二八頁。

② 同上，第二八——二九頁。

向前發展着和改善着的；地域方言爲人民羣衆服務，並在民族語言形成的歷史上有重要的作用。

這一切爲斯大林所首先製訂的原理，是互相密切關連着的，構成了一個統一和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原理都彼此互爲依據，或相反地，而又能互相引伸。

根據這些原理不能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任何一種現代民族語言都是它所經歷的複雜的歷史道路的產物，都是歷史所形成的，它的各個要素都可以追溯到不同的，而且往往是很古的時代。這一結論不僅涉及該民族語言的各種結構要素（語音、形態、句法、詞及詞義），而且也涉及它在地區上的各種變形——地域方言。

語言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發展着。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和社會歷史之間的聯系問題尙有待於研究。然而無可置疑的，各種方言的流行地區，和方言現象的地區的擴展，則取決於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

正是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深刻的歷史主義，消除了下面的這個原理中顯然是表面上的矛盾，即語言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組成員是共同的，同時却還存在着地方或地域方言。雖然語言從來就是全民的，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組成員是共同的，但是社會本身從原始公社制度時代起到現在爲止却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這些變化就不會不在語言上留下一些自己的痕跡，或某種『烙印』。

所以在研究作爲社會現象的方言中的語言發展時，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

我們知道民族語言和方言是屬於歷史範疇的。這就是說，它們不會永遠存在的，它們按照自己發展的內部規律改進

着，向前發展着，在長時期內服務於按其地域範圍和社會經濟結構均所不同的各個社會。這在現代各方言的相互關係及其地域分佈當中反映出來了。

列寧早在一八九四年關於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問題就這樣寫過，理論『……作出了社會經濟結構的概念。它以對人類共同生活說來的一個基本事實——謀取生活資料的方法——為出發點，從而提出了在某一特定謀取生活資料的方法影響下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在這些關係（馬克思稱這種關係為「生產關係」）的體系中指明了那種帶有政治、法律形式和某種社會思潮的社會基礎。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每一種生產關係的體系都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有其本身的發生、機能和過渡到高級形式、變為另一種社會結構的特殊規律。』^①

因此各社會經濟結構相互交替時代的社會發展規律，是極不相同的：在原始公社制度時代是一種規律，在階級社會又是一種規律。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結構（奴隸制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的時代的社會發展規律也極不相同；同時社會發展規律在每一個社會經濟結構的範圍內的不同發展時期中，也是不一樣的。從本質上起變化的新的社會關係產生於社會主義社會。

各種社會經濟結構時代中的不同的社會發展規律性引起地域方面各親屬語言和方言的區分。某些時代主要是引起語言的分化，組成許多彼此相接近的語言，相反地，而在另一些時代，則發生它們的大規模或小規模的統一和匯合。因此，在某些時代主要是發生方言的分歧，而在另外一些時代

① 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和司徒盧威先生著作中對民粹主義的批評」（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一卷，第三九〇頁）。

則產生了方言的一致、方言分歧的消失、方言的統一、方言之被部族和民族語言所吸收等現象。

在某些歷史條件下，語言分歧的出現是富有生命力和富有效果的過程，也就是說，它的存在是該時代的社會經濟關係所促成的。而在另一些歷史條件下却相反，語言分歧的出現則具有衰亡、殘存、退化的性質，也就是說和存在於該時代的社會經濟關係沒有聯繫，但却相反地繼續存在，雖然該時代已經存在着另一些調和方言分歧，促進方言統一的社會經濟關係。在後一種條件下，方言之所以存在，因為新的社會關係還沒有完全來得及或在可能的範圍內來吸收它們，把它們融化在適應新社會的統一的新語言中。

必須牢牢記住：語言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每一個時代裏，它都是從過去時期的發展中被繼承下來的東西。這個被繼承下來的語言，特別是它的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是按照它的發展的內部規律，慢慢地發展着，並且某種語言現象在一個地域上傳佈的廣泛或狹小，是以社會發展水平、具體歷史條件來決定的。

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關於語言和方言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問題。

四

在階級社會以前的整個一段時期中的特點，就是人們生活於零散而孤獨的小團體中。甚至在階級社會以前的高級階段——氏族社會——各部落內的人口數，雖然已比過去時期增加得多，但也不大^①。各個人口稀少的部落都彼此分散在

^① 例如恩格斯指出『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數，在兩千人以下』（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一版，第八七頁）。

廣大的領域上，佔着巨大的面積。同時這些單獨的部落與一定的多少明確固定的地域上的聯系也是很薄弱的。

原始公社制度時代，部落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一樣，每一個部落在語言上是統一的。斯大林有一句關於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話，他說：『……那時語言對人們的整個集團是共同的，統一的。』^①

部落的不斷分裂和瓦解是氏族社會中部落發展的基本過程。每個部落依據人口增長和地域分隔的情況，分爲幾個部分，各部分本身又逐漸變成爲一個部落，於是就組成了近親的諸部落。由於部落的分解，它的語言也因而分解，又組成了新的近親的諸部落的語言。恩格斯認爲這個過程的特點是『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與新方言』。^②

應該着重指出，由於往昔統一部落的分裂而組成的新部落，恩格斯稱之爲『血緣親族』。親屬語言是與那些由於往昔統一部落語言的分裂而組成新的部落語言同時形成的。恰如近親部落有同一的來源——起源於從前存在過的某個部落一樣，近親部落的語言也有其同一來源——起源於從前存在過的某種部落語言。

馬克思寫道：『不斷分化的趨向根源於氏族組織中的因素；必然的，在它們（即蒙昧和野蠻時期的部落）的社會狀態和佔領廣闊領土的情況下，這一不斷分化的趨向就加強了語言中形成差別的趨向。雖然口頭語言在其詞彙方面是相當穩固的，特別在語法形式方面更顯得穩固，但它不可能始終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九頁。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第一版，第八七頁。

不起變化。地方性的分隔，在空間方面逐漸導致語言差別的出現；這也導致利益的特殊化和完全的獨立。』^①

因此，在氏族制度時代裏，與社會成員分爲若干近親部落相適應的，存在着許多親屬的、共同來源的、文法構造與基本詞彙相近的部落語言。它們相互之間近似的程度，可能不一樣：它是受相應的部落之間的近親程度所制約的。

然而，應該注意到：作爲社會單位的部落，並不是最基層的單位，它是由於許多氏族的聯合而形成的。因此隨着氏族語言之統一成爲一個共同的部落語言，氏族語言就在這共同的部落語言中變成了方言。這就發生了語言與方言的對立，也就是部落語言和作爲部落組成員的氏族的方言之間的對立。這以後任何一個時代的地方方言都反映出過去語言的全民形式。根據這個一般的原理，部落語言中的方言可以溯源於很久以前曾經存在過的氏族語言。

關於語言與方言在以後各階段中的發展，斯大林曾以下述的原理加以闡明：『至於語言的繼續發展，從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從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從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在所有這一切階段上，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的語言是全社會統一的、共同的，是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的，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怎樣。』^②

此後，由於社會的氏族組織的瓦解，產生了近親部落聯盟。同時，因爲建立了近親部落聯盟，也就發生了聯盟中的近親部落語言的統一。

在近親部落聯盟的共同的和統一的語言中，各部落的語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九卷，第七九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九頁。

言就逐漸變成了它的方言。於是就產生了部落聯盟的語言與該聯盟各部落的方言的對立。在社會的氏族組織瓦解和形成爲社會的基本單位的近親部落聯盟時，近親部落聯盟的共同的語言也就越來越變爲基本的語言單位，而與方言區別開來。

特別重要的是：近親部落聯盟的語言共同性，並不是在聯盟建立過程中新產生的，而是以繼承過去語言的共同性爲基礎的，也是近親部落聯盟中各個部落起源的共同性的結果^①。

因此，過去時代（形成新的近親部落與語言的時代）的社會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下一個時代（氏族制度瓦解的時代及以後部族形成的時代）社會發展的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爲近親部落聯盟及其統一的語言發展所必需的語言共同性，在以往發展的過程中並沒有遭到破壞。

在氏族制度瓦解和過渡到階級社會的時代裏，隨着財產不均現象的出現，地域的劃分便代替了部落的劃分。在地域方面出現了日益增長的人口穩固性。替代氏族和部落而越來越顯出佔首要地位的『……只是依居住地來劃分公民的辦法……。有決定意義的已不是氏族團體的籍別，反而是經常居住的地區了；現在加以區分的，不是人，而是地域了；住民在政治上已變爲地域底簡單的附屬物了。』^②

同時，在個別近親部落聯盟的基礎上，或在若干這樣聯盟的聯合基礎上可能組成部族。某一部族內各部分方言的逐

① 參看雅柯平斯基教授所作的很有趣味的論文『部族及其語言的形成』（見列寧格勒大學公報，一九四七年，第一期）。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一版，第一一二頁。

漸統一，是部族組成的結果，這是在過去各時代的社會發展中所形成的。

斯大林教導說，部族各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歷史告訴我們：這些部落和部族的語言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全民性的，而是對於每個部落和部族是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①其次，關於適應這些歷史時期的方言：『當然，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佔着統治地位，並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②

在近親部落聯盟以及部族的社會組織成員中，可能在個別情況下，出現有非近親的，操異族語言的部落。這樣就可能引致各部落的混同和融合，同時，引致各種語言與方言的混同和融合。但語言的融合，如同斯大林所說的，並不能給予語言歷史什麼重要東西，例如，俄羅斯語言史家不能指出俄語文法構造的任何一個特徵是由於融合的結果而出現的。只有在很困難的情況下，同時僅僅主要是在邊疆地域俄語的方言中，在過去非俄羅斯居民轉用俄語的情形下，才有可能指出個別語言特徵是由於語言融合的結果而出現的。

五

斯大林寫道：『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現了印刷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九——一〇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〇頁。

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在這個時期中許多部落和部族分開了和分散了，聚合了和融合了。往後，出現了民族語言和國家，發生了革命，發生了舊社會制度與新社會制度的交替，所有這一切使語言及其發展發生了更大的變化。』[⊙]

隨着階級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集團發生了大量的合併。國家形成了，部族的建立和鞏固也在不斷的推進着，居民在地域上的穩固性增長着，他們漸漸的聚集在城市的周圍。

大家知道，例如，東斯拉夫人民是依照地域的標誌而聯合起來的，這就順便說明舊的部落名稱的逐漸消失，而由城市中心區的居民的名稱所代替的情形。舉例說，如在我們的史籍中『斯洛文人』改稱為『諾弗哥羅德人』，『維雅迪奇人』改稱為『里亞贊人』等等。

大家同樣的知道，東斯拉夫諸部落的舊名稱，並不是同時一起喪失的，因為不同的東斯拉夫部落是處於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上，並於不同時期擺脫部落制度。在史籍中最後一次於九四四年提到『波利安人』，於九九〇年提到『德列夫利安人』，於一〇一八年提到『斯洛文人』，於一一二七年提到『克里維奇人』，於一一四九年提到『德累哥維奇人』，於一一六九年提到『拉底米奇人』，於一一八三年提到『塞維里安人』，於一一九七年提到『維雅迪奇人。』[⊙]

這些歷史材料充分的說明，為什麼『波利安人』的部落名稱比所有其他部落的名稱消失得早，相反地，也說明為什麼

⊙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二四——二五頁。

⊙ 參考這些材料的時候，應注意到各部落的名稱就在擺脫部落制度後，尚能繼續保持若干時期。然而各部落名稱不是在同一時候消失，却充分地保留其真實性。

麼『維雅迪奇人』的部落名稱保持了那麼久。這是很自然的，生活在基輔——國家萌芽的中心——周圍地域上的『波利安人』，最早過渡到階級社會，而與此相反，『維雅迪奇人』在社會政治的發展方面則落後於東斯拉夫的其他部落。『維雅迪奇人』住在東斯拉夫領域的荒遠邊區，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與古代羅斯人的共同政治生活沒有密切聯繫，因而擺脫原始公社制度的因素也比其他部落遲後一些。

這樣一來，地域方言就代替了部落方言。同時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的作用也就複雜化了——文字出現了，文學語言不斷的發展和改進着。於是就發生了作為文學語言基礎的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對立。書面語言在自己的發展範圍內顯著地影響地方方言的發展。

封建時代的特點是封建領地，『許多獨立的小國家』的形成^①。在自然經濟和小商品生產的條件下，各領地——國家的發展必然的要帶有或多或少的孤立性。它們之間的聯繫通常是薄弱而偶然的，也沒有廣泛聯合的趨向。這種情況促成了與封建領地相當的各個區域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分隔狀態，也促成了它們的相對的獨立性。

列寧關於這一點和往後各時代的情形，曾經這樣說過：

『在古代俄國還可以說有過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紀，在莫斯科皇朝時代，這種氏族聯繫就毫無疑義已不存在了，就是說，當時國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團體上，而是建立於地方團體上：地主和教堂接納了從各地來的農民，而這樣組成的村社就成為純粹地域性的團體。但是在當時還很難說已有

① 參看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對於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的一些意見』（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北京修訂四版，第三四〇——三四三頁。

真正的民族聯繫：當時國家是分成爲個別「領土」，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侯國，這些侯國保存有從前那種自治制度底鮮明遺跡，有其管理方面的特點，有時候還保存有自己特別的軍隊（地方諸侯是帶領着自己的軍團去作戰的），特別的稅關等等。僅僅在俄國歷史底新時期中（大約自十七世紀起），這種區域、領土和侯國才真正在事實上溶合爲一個整體。請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這種溶合並不是由氏族聯繫所引起，甚至不是由這種聯繫底繼續和綜合所引起，而是由各個區域間日益加強的交換，由逐漸增長的商品週轉，由各個不大的地方市場集中爲一個全俄市場所引起的。既然這個過程底領導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資本家，所以這種民族聯繫底創立也就無非是資產階級聯繫底創立。』^①

在這些條件下，封建制度時代方言的發展有兩種代表性的過程。一種過程是各封建領地之間在很長的期間內已經存在着多少比較穩定的境界的時候，其中每一個封建領地之上也就產生了語言的獨特性，並且各個封建領地根據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出現了互相間愈來愈增長的語言分歧。另一種過程發生在單個封建領地的內部。這一封建領地是形成於較早時代的部落聯盟和部落的方言地域之上。當時封建領地（小國家）的地域與部落或近親部落聯盟的地域並不常常相吻合。封建領地能够在若干部落與部落聯盟的地域上發展起來。同時，一個部落或一個部落聯盟的地域，也可以分別隸屬於不同的封建領地之內等等。因此封建領地在產生的時候，就能够把那些在語言方面具有某些分歧的居民統一起來。但是，在其進一步發展中，由於各封建領地（小國家）互相間的孤立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一版，第一卷，第一一一——一二頁。

狀態，並且各自具有單一的經濟和政治的結構，因而能够在全部領地內產生比較統一的語言，只不過某些地方仍有方言的差別罷了。

一般說，居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繫的破壞，久而久之就能够引起語言的共同性的破壞，就能够引起每一塊獨樹一幟的地域本地的，又僅是該地域所固有的語言特點的出現。相反的在各個從前孤立的地域之間密切的聯繫，就能够引致方言特徵的消失，就能够促使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已統一的所有地域上新的語言的形成和傳播。

因此，封建制度時代的特徵，一方面是在單獨的封建單位（領地，侯國——『小國家』）內部舊有方言的結合、統一，並逐步形成其統一的語言；另一方面是各封建單位語言愈益獨特化，彼此之間的差別也愈大，在不同的封建領地地域上發展着不同的新的語言特徵，許多在不久以前出現的方言特徵就是在封建分割時代成熟起來並大部分的固定起來，雖然這些方言特徵的根源，在許多方面都是萌芽在相當古的時代。

然而，各國封建制度都有其極不相同的形式。此外，封建制度在不同的發展時期裏也是彼此極不相同的；只要對比一下封建以前的時期——封建關係發展時代和封建分割時代以及更後的一些時代就夠了，更後的一些時代的特點就是城市的發展，資本主義因素的增加，不同程度集中的大國的建立。按照封建制度時代親屬語言及方言的語言現象在地域上的分佈，不論在不同的地區或在各不同的封建時期內都具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關於這一切，語言史家應當進行全面的、深刻的研究。

在某種情況下，封建國家在數百年內保存了不變的地域

境界。由於有了這樣一個長的時期，當然就能够形成比較統一的地域方言。在另一種情況下，封建國家的境界由於地域的合併而逐漸擴展，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預料到方言現象的境界的多階段的劃分。又在某些情況下封建國家之間的境界並不固定——它常常變動到這一方面，或另外一方面，所以同樣一塊地域常常忽而在這個國家的境內，忽而又在另一個國家的境內，這就不能不表現出缺乏明顯的方言特點的界限。

在封建時代裏，常常發生把從未有人居住的，或居住着另外的操異族語言的人民的新地域變成殖民地方的事情。在新的殖民地域上的方言發展是依據具體的歷史條件而具有極其特殊的形式。

上面已經指出，部族在相當早的時候就已開始形成。馬克思指示我們，部族形成歷史中的一個決定性的階段是近親部族聯盟：『……在氏族制度內，只有當各部落在一個管理機構下聯合起來，並融合成一個整體的時候，才能產生部族，例如阿提克的四個雅典部落，斯巴達的三個多里亞部落，羅馬的三個拉丁和薩賓部落。聯盟須先存在有佔領單獨地域的獨立部落，而融合乃是更高級的過程，在一塊共同地域上把各部落統一起來，雖然按照氏族和部落的地方劃分的趨向還繼續的存在着。部落聯盟最接近於部族。』^①

因此，部族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關係的產物。以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關係來說，例如封建生產關係來說，則是尚未發展成為民族的部族的經濟基礎，其特徵是經濟分散，地域間缺乏勞動分工，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部族各部分之間的相對的分隔狀態。這就說明了上面敘述過的作為封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九卷，第七九頁。

建制度時代特徵的語言發展的特點。

然而，封建制度時代各個區域的經濟和政治的獨特性是相對的，同時，其方言的獨立性也是相對的，所以，除了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個別區域外，通常在一個發展着的大國範圍內，形成部族及其具有方言區別的統一的語言。

應該指出，在封建制度時代，作為一個封建領地（侯國、國）境界內的共同語言的地域方言，並不常常是和已經形成了的或正在形成中的部族語言相同。封建領地的方言往往比部族語言更狹隘。許多封建領地（侯國、國）的居民——這些各種地域方言的使用者，常常是屬於某一個部族的，而且把自己使用的地域方言認為是自己部族的共同的和統一的語言的變形。

僅僅在方言上有所差別的統一的部族語言的共同性，正如上述，它的歷史基礎是承繼了過去語言的共同性，這就說明了起源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存在於這些部族的口頭傳說中及人們的自覺意識中。但是這種共同性，同時也是在發展着的共同性，因為部族（正如以後的民族）也是在發展着的。這種共同性在發展中的特點，就表現在新的語言特徵普及於整個部族。關於部族及其統一語言的真實存在，這可由古代文化中的古典文獻所反映出來有關這個部族人們的自覺意識及其自我估計的材料，清楚的予以證明。（例如在個別地域，如基輔、諾弗哥羅德、斯摩稜斯克等地存在時的基輔時代的古代俄羅斯社會中的概念『羅斯』和這些地域的地方方言。——這一概念在一定的時代裏包括整個的古代俄羅斯部族。）[⊙]

⊙ 參閱鮑古斯拉夫斯基：『第六——七世紀基輔羅斯作品中的俄羅斯土地』，載『國立莫斯科大学札記』，第一一八期；利哈切夫：『古代羅斯的民族自覺』，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四五年。

文字的產生和發展，書面語言和文學語言的發展是許多部族語言發展中的重要因素。資本主義前期書籍中的文學語言特點，就是大部分書籍不是建立在本部族全民語言的基礎上，而是在異族語言的基礎上。例如，西歐中世紀曾經有過的書面文學語言是異部族的拉丁語，這特別是對於德國人、波蘭人是生疏的。同樣，近東各部族曾經有過的書面文學語言是阿拉伯語。這對於那些部族也是生疏的。東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却是另外的情況，他們的書面文學語言（即所謂古斯拉夫語，宗教斯拉夫語）是在極相近的親屬的斯拉夫方言之中的一個方言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相近的親屬方言在這個部族的全民語言和文學語言基礎中的相互作用，對於所有這些斯拉夫語言的發展和豐富有很大的優越性。基輔國家時代的俄羅斯（東斯拉夫）文學語言所以能夠很快地成為豐富的、靈活的和加工的語言，並以之創造最豐富的文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

基輔國家時代的書面語言和全民口頭語言的相互關係，其特徵就在於存在有兩種極不相同的書面語言類型，即除了宗教斯拉夫語，即在東斯拉夫的古斯拉夫語言中發展着的、已經俄羅斯語化並在繼續俄羅斯語化的以外，還另有一種書面語言的類型在全民語言的基礎上存在着和發展着，服務於要求有條理的文書的國家的需要（這種語言類型使用於法律和事務的文件）^①。這種書面語言的分歧不僅保存了下來，而且在十五——十六世紀俄羅斯（大俄羅斯）部族形成時代的俄國裏更厲害起來，宗教書籍語言『宗教斯拉夫語』繼續存在着，而與此同時，事務語言也在廣泛的社會基礎上發展着，它在十

① 僅在早期古俄羅斯文學最傑出的著作中發現有綜合這兩種類型的文學語言的意圖，如『伊戈爾公出征記』。

六世紀時對於整個的廣闊的國家幾乎已經是共同的語言了。

部族語言全民的和地方的要素間的相互關係的特徵，可以因在不同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的不同部族而有所差別。其共同之點，就是資本主義前期方言的特徵在於具有相當大的穩固性，同時，在邊區的地方，新的方言分歧能夠繼續發展，並且經常繼續發展。然而從總的方面來看，部族語言的歷史的和繼承下來的共同性在該部族往後發展的過程中，在有利的條件下能夠再加擴大。例如，十四——十六世紀的俄羅斯語言史可以指出許多這樣的文法、語音、詞彙的現象，它們包括着中部和東北部，這也就證明了大俄羅斯部族的語言共同性是繼續發展着的，但是它們並不分佈在西部和西南部，大約那裏也在同一時期形成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部族及其語言。例如：試比較以下 *ый* 和 *ий* 變為 *ой*, *ей* 的變化（請比較俄羅斯語中的 *мою* [我的]，*шея* [頸] 和白俄羅斯語中的 *мыю*, *шыя* 烏克蘭語中的 *мию*, *шия*)；又如出現在俄語中一些名詞複數第一格形式上的重音，而那又是陽性名詞（*Города* [城市]，*Дома* [房屋]，*Леса* [森林]），這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語言所沒有的等等。

由此可知，封建領地（小國家）和部族是封建社會的範疇，其根源存在於遠古時期。地域方言與部族方言就是以語言的特殊形式來適應着這些範疇的。

六

在大國形成的時代，隨着管理機構集中化的規模，城市的成長，商業的發達，以及統一市場的形成，在廣泛的全民基礎上共同的行政事務的語言得到了不斷的發展，這種語言到後來由於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在形成民族語言的情況下，

而變爲文學語言的基礎之一。

民族是在封建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候形成的。斯大林教導我們說：『民族不是普通的歷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人們形成爲民族的過程。』^①大家知道，語言共同性是民族極重要的特徵之一：『民族——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②隨着民族的形成最後形成了作爲民族的主要特徵之一的，對民族是共同的民族語言，因爲，正如斯大林所指示的，『……民族的共同體非有共同的語言不可』^③。後一原理斯大林在自己的語言學著作中覺得也有必要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說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標誌之一，同時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內部存在有階級矛盾。』^④

民族形成時代的特點就是經濟與政治的集中。列寧曾經指示過：在這個時期內個別的從前單獨的封建區域、領地和公國融合爲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由各個區域間日益加强的交換，逐漸增長的商品週轉，地方市場集中爲一個全民族的市場所引起的。

列寧在另外一部著作裏寫道：『在全世界上，資本主義徹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總是與民族運動相聯的。這種運動底經濟基礎是在於要保證商品生產達到完全勝利，便必須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一版，第二卷，第三〇〇——三〇一頁。

② 同上，第二卷，第二九四頁。

③ 同上，第二卷，第二九二頁。

④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三頁。

使資產階級奪得國內市場，必須使同一語言的人民所居住的地域用國家的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阻礙這樣語言發展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最重要的人類交際工具；語言統一及其無阻礙的發展，是保證商品週轉能適應着現代資本主義而真正自由廣泛發展起來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廣泛地劃分為各個階級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最後，是使市場與所有一切大小經濟主人，賣主及買主密切聯繫起來的條件。」^①

因此，問題就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一樣，『方言集中為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引起的』^②。

斯大林在下面的原理中天才的說明了這個過程：『往後，隨着資本主義的出現、封建分割的消滅、民族市場的形成，於是部族就變成爲民族，而部族的語言就變成爲民族的語言。歷史告訴我們：民族語言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全民性的，是對於民族組成員共同的、對整個民族統一的語言。』^③

民族語言作爲語言的特殊形式適應於資本主義社會範疇中的資產階級民族，這也就是說民族語言是整體的，並包括文學語言，更正確的說，這是經過加工的文學形式的民族語言，也包括一切種類的民間口語。因此，全民性的民族語言是這個民族全體成員的財產，實際上這個民族是使用着一種由自己歷史所決定的變形語言。

正如我們所已知道的，語言共同性是民族最重要特徵之一，它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它的根源是存在於遠古時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一版，第一卷，第八二二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四一四頁。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〇頁。

期。資本主義社會繼承了過去時代的語言。同時，這個繼承來的語言共同性依照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更加發展和鞏固着。新出現的語言特徵包括着整個民族語言，這就證明了民族生活中的語言共同性。

正如斯大林所指示的，民族語言可能是在某一種地方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爲民族語言底基礎並發展爲獨立的民族語言。』^①在這樣情況下，這些語言中的其他方言『……喪失了自己的獨特性，溶入這些語言中，並在這些語言中消滅了』^②。這意思就是說，從民族語言形成的時代起，就已逐漸不再形成新的方言分歧了。舊的方言分歧雖然在頗大的程度上保持其本身的穩固性，但終究逐步開始受到民族語言規範的影響，喪失自己的獨立性，溶入這些語言中，並在這些語言中消滅。可是由於人民所創造的地方方言多少世紀以來的穩固性，這是一個極長的過程。正因爲這個緣故，許多方言分歧甚至於在社會主義民族的語言中，仍然以某種形式存在着。

斯大林的下面這個指示特別重要：『也有相反的發展過程：一個部族由於缺乏必要的經濟發展條件而還未成爲民族，它的統一的語言因爲國家崩潰便瓦解了；至於還沒有在統一語言中被磨掉的地方方言，却活躍起來並成爲形成單獨獨立語言的基礎。』^③

語言史家運用這個指示，就有可能以馬克思主義來說明民族語言形成的極複雜的問題，特別是兄弟民族——俄羅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四三——四四頁。

② 同上，第四四頁。

③ 同上。

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的語言形成問題。

歷史學家與東斯拉夫人民語言史家都無疑地相信在我們的歷史上的基輔時代有俄羅斯部族與俄羅斯語言的存在。可是這些概念同時還具有其他的內容：它們意味着這樣的部族和語言，即在其基礎上形成了後來的現代社會主義各兄弟民族——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其語言。

正如大家知道的，基輔國家的歷史是短促的。由於進入了封建割據時代，在遼闊的東斯拉夫領域的各個部分內，在不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條件下，在還沒有被統一的語言消磨掉的地方方言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諸部族——俄羅斯（已經包含新的、更窄狹的意義『大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其語言。在這些部族及其語言的基礎上，以後又形成了相應的民族與民族語言。但應當指出，東斯拉夫所有各民族及其語言共同來源的觀念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一直都保存在人民的意識中，並且現在還保存着這種觀念。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各語言之間新的關係也在本質上證實了這個觀念。

民族語言形成時代的特徵是：從前存在過的非本族人民的書籍文學語言的使用範圍不斷的縮小（例如西歐的拉丁文、俄羅斯的宗教斯拉夫文）。這些語言逐漸轉變成為專門用語（如宗教儀式用語、科學中的常用語），以後則可能完全停止使用。同時，民族語言形成時代的另一個特徵則是產生在全民語言基礎上的民族形式的書面語言的使用範圍的擴大。民族形式的全民語言在不同的程度上依靠書籍文學語言的使用來豐富自己，並逐漸成為統一形式的書面語言和文學語言。因此，民族語言形成時代的特徵就是逐漸消除書面文學語言和正在形成的民族口語規範間的不協調現象。一切妨

礙本民族語言在書籍中鞏固下來的東西都被排除了，活的全民口語和書面文學語言在很大程度上的接近是民族語言的特點。

民族語言的規範隨着自己的鞏固給予方言以越來越有力的影響，因此方言口語就開始逐步消失其最突出的特點，並和規範化的口語相接近。

民族形成的道路，由於所依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期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的不同，往往極不相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這個問題在斯大林的許多民族問題的經典著作中曾加以天才的分析。由於各種現實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各個民族語言的發展也具有極多種類的形式。關於這些問題，蘇聯的語言學家應當予以精細的研究。

七

正如上面所敘述的，根據斯大林的學說，地方方言為人民羣衆服務，具有自己的文法構造與基本詞彙。但是應當注意，親屬方言間互相的區別，並不是整個文法構造及基本詞彙，而僅僅是在某些個別的因素上有些差別。這些差別在某些歷史條件下的整個過程中逐漸增加着，在另一些歷史條件下則相反，而是逐漸減少和消失。特別需要着重指出的，方言分歧能够牽涉到語言的各個方面，包括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也包括語音系統。

在那樣時期，即當語言分化過程是語言有效果的活躍的過程時，某一個地方的語言對其所有居民仍舊是統一的。這不僅屬於階級社會前期的情況，並且到了階級社會——封建制度時代的情況也是同樣的，因為語言在其發展的所有階段上對社會全體組成員都是共同的和統一的。因此在任何封建

領地或侯國境內，無論封建剝削者或者是被剝削的居民都同樣使用本地方言。當然在他們使用的語言中，還有若干不同之處，這可由他們在階級社會中所處的不同的生活條件來說明，但這些差別主要是屬於語言的詞彙方面，並不涉及文法構造與基本詞彙，同時，也不涉及語音系統。例如，關於這一點，可以拿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俄羅斯有領地的貴族所使用過的語言的材料來加以證明，這些材料多少反映在私人書信中。

但是從資本主義時代起，我們通常已經看不到語言分化的過程。過去時代裏範圍比較狹隘的全民語言都已經變為方言，即變為殘存的、衰亡的範疇。資本主義時代，照例說，已不會再出現新的方言分歧。經過加工的文學形式的民族語言漸漸的排擠各種方言，而這些方言也就越來越成為農村居民，農民的財產。

可是，一方面由於許多世紀所造成的語言特徵的穩固性，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矛盾，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因而資本主義時代方言分歧的消除通常是很緩慢的在進行，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各個地域內進行的情況也極不平衡。祇有引向城鄉矛盾的消滅，引向人民羣衆文化高漲的社會主義制度，方能保證文學形式的民族語言完全排除方言口語。這種文學形式的民族語言根源於人民語言中最深厚的部分。文學語言於促進排除方言的同時，也在與方言的交互作用過程中豐富了自己。

從上述可知，由悠長的人民歷史所制約的語言中的方言要素是複雜的、多種多樣的。因此在俄羅斯語言學的文獻中，除了『Диалект』（方言）這個術語之外，還有『Наречие』（地方話）和『Говор』（土話）。前者（指Наречие）的意義

與後者（指 Говор）相比，要廣泛些，後者的意義要狹隘些。地方話（Наречье）是由許多土話（Говор）組成的，土話之間大體上相似，但也有部分的差別。兩種以上的地方話就能組成某種語言，因此，土話之間的關係比起地方話之間的關係就顯得密切。同時，土話與地方話比較起來，土話包括地域單位特別小。在語言學著作中，還使用次地方話（Поднаречие）和次土話（Подговор）這一類術語，它們在語言的方言要素中的作用與地位僅從其本身的名稱上就看得出來了。

『Диалект』（方言）這個術語在俄羅斯科學著作中，無論在意義比較廣泛的『Наречье』（地方話）方面或在意義比較狹隘的『Говор』（土話）方面都被使用。某些學者認為『Диалект』（方言）這個概念是介乎『Наречье』（地方話）與『Говор』（土話）之間的概念。不能不指出這些概念的全部相對性。

在某些情況之下，同樣要區分語言與方言，也會遇到相當的困難。應當注意到，這種區分並不能拿結構共同性的程度來決定，也不能拿相互之間的理解性或不可理解性的標誌來決定，正如某些國內外科學界人士曾設法證明的，而應當拿社會的原因來決定。例如，這樣的現代的民族語言，有如俄羅斯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按照其本身的文法構造與其基本詞彙來看，其相互之間的接近程度遠甚於德語各方言之間的相近程度。但是前者成為各種語言，而後者則仍舊是一種語言的各個方言。由此可知，問題的決定並不在於它們之間的文法構造與基本詞彙的相近程度，而在於歷史性質的原因——社會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原因。由於這些原因，前者的使用者組成了各個不同的民族，而後者的

使用者則成爲一個民族的組成部分。

同時，不論在某種情況下出現的民族語言，語言共同性在任何情況下的特徵都不是存在着反映過去殘餘的方言分歧，而是包括全民族的語言的新生現象。後者是民族生活中語言共同性的無可懷疑的證明。

在解決如何區分方言與語言的問題時，應當根據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的指示，即部落與部族都有全民性的語言，對於他們是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當然，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佔着統治地位，並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①

另外一個地方，斯大林在引證馬克思關於民族語言形成問題的見解時，寫道：『可見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爲最高形式，而把低級形式的方言服從於自己。』^②

根據斯大林的這些指示，地方方言應當被認爲是全民語言的變形，它們流行在某一種語言地域的部分地區，並作爲低級的形式來服從某個部落、部族或民族的統一的語言。

八

上面所敘述的關於語言與方言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的形成問題是與歷史比較法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

馬爾的反歷史的形而上學的理論，就在於他認爲任何時代世界上的一切語言，在任何歷史情況下都是走『匯合』和融合的道路，由多種發展成和正在發展成爲統一的語言。但是科學却早就證實，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要發生語言的瓦解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〇頁。

② 同上，第一二頁。

與分化，通過親屬語言及方言的形成，由統一的語言發展為各種各樣的語言。馬爾及其追隨者們的這種『理論』是與不分皂白的否認歷史比較法相聯繫着的，認為歷史比較法彷彿是唯心論的，這種否認，斯大林曾經予以斥責。馬爾反對在語言學中早已有所表現並給予有價值的效果的歷史比較法，而提出了自己的真正唯心的古生物學的方法——所謂四種要素的分析法，這個妄誕的觀念認為任何時代、任何語言的每一個詞都可以溯源於四種要素（「сая」「бер」「йон」「рош」）。

關於這一點，斯大林曾經寫道：『馬爾大肆叫囂，指斥歷史比較法是「唯心主義」的。其實應當說，歷史比較法雖然有其嚴重的缺點，還是比馬爾的真正唯心主義的四種要素的分析法要好些，因為前者還推動着研究語言的工作，後者只是要人躺着，環繞着鼎鼎大名的四種要素去作無意義的推敲猜想而已。』①

斯大林嚴正的指責了馬爾否認歷史上已被證實的語言親屬關係的事實：『馬爾目空一切地指斥研究語言類別（系族）的任何企圖，認為這是「母語」理論的表現。其實不能否認語言的親屬關係，如各種斯拉夫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是無疑地存在的；研究這些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是會使語言學在研究語言發展規律方面有很大益處的。』②結合着人民的具體歷史來研究如斯拉夫語、日耳曼語、羅馬語和其他等語言類別（系族）的親屬關係，是語言學的一個重要任務。這就確定了歷史比較法在研究語言歷史上的意義。

事實上，從各親屬方言或者語言連貫起來的那種特徵來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三二頁。

② 同上。

看，上溯到共同的語言——來源，就能證明過去曾經存在過語言的統一。相反的，從把各親屬方言或者語言區分開的那種特徵來看，就能證明過去曾經由於社會分裂導致的語言的分裂。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之下，它們都反映了語言隨着社會歷史而發展的歷史途徑。

由上所述，在對於一個語言類別（系族）範圍內（如斯拉夫語族）的親屬方言與語言的歷史研究中，在相當大的程度內決定了歷史比較法的意義。由於歷史比較法的幫助就能夠得出被研究的親屬語言與親屬方言構造中的相應的要素（相似的和有區別的特點）的共同起源。歷史比較法幫助我們更深刻和更完全的了解現代語言及其發展方面的事實。因此，沒有歷史比較法就搞不好語言的歷史。然而，在運用歷史比較法的時候，我們應當記住斯大林在指出它的優點的時候，也會同時指出它存在有若干嚴重的缺點。因此，應該盡可能正確的劃出可能和合理運用歷史比較法的範圍，同時也應當闡明在什麼情況之下不能運用。

例如，在這種情況下，即當研究一種單獨的語言，而且沒有保存和它有親屬關係的其他語言與方言的時候，就不能應用歷史比較法。其次，在下述的情況下，即當被研究的語言的過去現象已在其下一時代中完全消失，甚至沒有保存其一鱗一爪的時候，也不能應用歷史比較法。例如，根據現代俄語的材料，包括其土話在內，而不知道俄語的書面的文獻遺留，就未必能夠確定曾經存在於古代俄語中的未完成式的事實。

最後，也應當注意到這一點，運用歷史比較法而擬構出來的事實常常是屬於不同的時代的，因此，就遠不能隨時把過去的語言體系從它的真實的歷史實際中復現出來。同時，

被擬構出來的事實所屬的時代愈古，被研究的各種語言和方言的語言親屬關係愈疏遠，那麼它們處在同一時代的可能性也就愈小，從歷史比較法的研究中脫漏掉的現象數量也就能愈多，這是因為它們在被保存下來的親屬語言和方言中已經完全消失掉，換句話說，被擬構的事實就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喪失掉語言體系中具體的和歷史上存在過的特徵。例如：東斯拉夫語言的統一性，儘管有方言的分歧，但這是簡單明瞭的歷史上的現實。然而全斯拉夫語言的統一性的擬構結果則已經是另外一些情況。藉助於歷史比較法而被擬構出來的全斯拉夫語言的特徵，無疑地反映出了語言的真正事實，但是這些特徵在許多情況之下都不屬於同一個時代。這就是說，從個別被恢復的語言事實的真實性來看，被恢復的『體系』就可能沒有具備充分的具體的、歷史上的特點和真實的語言體系的特點。另外一種情形，在運用歷史比較法研究整個語族，例如印歐語族的時候，就能夠揭露最複雜的、世代相傳的關係。

在其他同樣的條件下，如果在歷史比較法幫助之下與歷史材料和物質文化材料（考古學、人種學）有機聯繫地進行研究而獲得結果的時候，那末，在這種情形下歷史比較法就提供出優良的效果。

某些人認為，運用歷史比較法所獲得的材料與物質文化歷史的材料往往不相符合，這就證明歷史比較法的缺陷，也證明由於它的幫助而獲得的材料的虛構性。所謂語言『新學說』的擁護者們就常常利用這種情形作為反對歷史比較法的論證。然而這種論證的不正確性是毫無疑問的，因為運用歷史比較法所獲得的材料也是一種歷史材料，而且是語言的歷史材料，這些材料與物質文化歷史材料的不相符合只是證明，語言區分與人種區分的不相符合，也只是證明視二者為一事。

的不可容忍，也只是證明研究其相互關係的必要性。

應該指出歷史比較法在某一方面有其局限性。在歷史比較法的幫助下，可以把實際存在的語言分歧上溯到共同的來源（共同語言），但卻不能從後來時代的語言共同性出發去追想過去時代的語言分歧。歷史比較法從來也不能夠脫離現實的語言事實，這正是它的一個大優點。在第一種情況之下，親屬方言與語言實際存在着的語言分歧所提供出來的材料，這也就是歷史比較法所運用的材料。在第二種情況之下，即在後來時代存在有語言共同性的情況下，並沒有為歷史比較法提供什麼材料來判斷在過去時代存在有語言的分歧。因此，即在歷史比較法的幫助下，也不可能探究出來從多種語言發展到統一的語言的發展途徑，雖然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一般的說，這種發展是可能的。

可以肯定，在語言發展的最古時期裏，語言分化的過程和語言瓦解的過程甚於語言融合的過程，甚於語言與方言的統一過程。因此歷史比較法是研究親屬語言在其存在的最古時期內部發展規律的不可缺少的工具。然而現代方言在很多場合下，不僅是最古時代語言分化的結果，而且也是語言融合、親屬語言與方言統一過程的結果，尤其在以後各時代裏特別強烈。因此，在歷史比較法的幫助之下，只能揭露親屬語言與方言來源的一般途徑，而不是它們的具體歷史。

在親屬語言與方言之中，可能有一些舊有的分歧，即不能追溯其共同來源的分歧。這些分歧往往並不太多，同時在語言歷史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管怎樣，它們總還存在着，應該認真的加以研究。因此，應當想出適當的方法去研究語言彼此之間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各種不同的相互作用，去研究這一種語言從另一種語言的借用等等。這些問題應該

密切聯繫人民的歷史和社會生活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研究。對親屬語言往昔的分歧的研究絕不應該和馬爾的反歷史的、唯心論的四種要素的分析有任何共同之處。

九

斯大林不僅作出了在資本主義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裏形成民族語言的理論，同樣也作出了民族語言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於各個社會主義民族的形成，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的理論，而且也給予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後的時代中語言發展的完整理論。

關於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代中的語言發展規律性問題，斯大林在二十年前所發表的『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這一著作和他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早已加以闡明了。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道：『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為什麼我們既主張各個民族文化在將來要溶合成具有一個語言的共同文化（就形式和內容說來都是共同的文化），同時卻又主張各個民族文化在現今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繁榮發展。但是，這裏並沒有絲毫奇怪的地方。應該讓各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和開展起來，顯露出它們所包含的一切潛能，以便造成條件保證使它們能在全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獲得勝利時期溶合成一個具有一個共同語言的共同文化。保證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在一個國家內存在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繁榮起來，以便使它們將來在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獲得勝利而社會主義已成為風俗習慣的時候溶合成一個具有一個共同語言的共同社會主義文化（按形式和內容說來都是社會主義的文化）——這就是列寧主

義的民族文化問題提法底辯證性。』^①

同時在反駁語言發展中的語言的質的突然變化或語言發展中的爆發的可能性時，斯大林又在『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這一著作中駁斥了以下這種錯誤的思想，即『在世界帝國主義失敗以後，從上面下一道命令，馬上一下子就可以使各民族差別消滅，使各民族語言自行滅亡』^②。

斯大林在這個著作中確定了民族語言於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取得勝利後的時代中的各個循序漸進的發展階段，斯大林寫道：『認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底第一階段將是民族和民族語言自行滅亡或開始，是統一的共同語言形成底開始，這是錯誤的。相反地，在第一個階段中民族壓迫將被最後消滅，這個階段將是以前被壓迫的民族和民族語言發展和繁榮的階段，將是確立各民族平等權利的階段，將是消滅民族互相猜疑的階段，將是很好建立和鞏固各民族間的國際主義聯繫的階段。』^③

斯大林繼續說：『只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第二階段，即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逐漸形成起來代替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只有在這個階段，類似共同語言的東西才開始形成起來，因為只有這個階段各民族才感覺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語言而外，還必須有各民族彼此間共同的統一語言，——這是為了交往的便利，為了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底便利。由此可見，在這個階段各民族單獨的語言和各民族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見『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一版，中級組第三冊，第一五六——一五七頁）。

② 斯大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八頁。

③ 同上，第一九頁。

彼此間共同的語言將並行地存在着。可能是這樣：最先創立的將不是一個包括着一切民族並具備有一個共同語言的世界經濟中心，而是幾個包括着一批民族並具備有這一批民族彼此間共同語言的區域經濟中心：只有在此以後，這些中心才會結合爲一個……全世界社會主義經濟共同中心。』^①

只有那個時候，『……當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充分地鞏固起來，而且社會主義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在實踐中深信共同語言優越於各個民族語言，——這時候民族差別和民族語言才開始自行滅亡，讓位於一切人們共同的世界語言』^②。

斯大林在『給同志們的回答』中提供了把唯物辯證法運用到社會現象中去的卓越典範，並簡明的指出在下述時代中由於各語言之間的交互作用將產生新質的過程，即在『……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世界帝國主義將不復存在，剝削階級將被推翻，對民族和殖民地的壓迫將被消滅，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將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權利底平等將被實現，壓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將被取消，各民族間的合作將被建立』^③。

在這個時代裏，『各民族的语言將有在合作方式下互相豐富起來的可能』『不用說，在這些條件下，——斯大林繼續說，——根本就談不到一些語言底被壓制和失敗與另一些語言底勝利。在這裏我們將遇到的不是兩種語言——其中一種遭受失敗而另一種成爲鬥爭中的勝利者，而是好幾百種民

① 斯大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九——二〇頁。

② 同上，第二〇頁。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五三頁。

族語言——這些語言由於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長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豐富的單一的區域性的語言，然後區域性的語言才溶合爲一個共同的國際語言，這種語言當然既不會是德語，也不會是俄語，更不會是英語，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語言和各區域語言底精華的新語言。』[⊙]

因此，斯大林教導說，若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前由於語言的融合而發生一些語言的被同化和一些語言的勝利，因而只能有勝利的語言與被戰勝了的語言，那末，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後的時代，各民族語言就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自由地互相豐富起來。

斯大林在其語言學的天才著作裏指出：『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是不能停滯不前的，——它是在發展着和改進着。』

『馬克思主義不承認絕對適應於一切時代和時期的不變的結論和公式。』『馬克思主義是一切教條主義的敵人。』[⊙]

在蘇聯語言學家面前，斯大林同志用很多明顯的例子闡明了由他所構成的爲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歷史研究奠立基礎的原理：『……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

蘇聯語言學家的職責就是將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英明的指示運用到自己專業的材料中去，根據斯大林關於語言與方言的學說去研究各語言的具體歷史，並在研究中大量地收集新的實際材料。

⊙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五三——五四頁。

⊙ 同上，第五五頁。

⊙ 同上，第二〇頁。

消滅語言學中的軍閥式的統治制度，放棄馬爾的錯誤，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語言學中去——創造性的執行偉大的斯大林所提出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語言科學的天才綱領，就會使蘇維埃的語言學健康起來，使它走上康莊大道，使『蘇維埃語言學能够在世界語言學中佔第一位』^①。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四二頁。